



杨和平 著

浙江近现代 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

*Zhejiang Jinxiandai
Yinyue Jiaoyujia Qunti Yanjiu*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 / 杨和平 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2

ISBN 978-7-5444-2730-2

I. ①浙... II. ①杨... ②江... III. ①音乐教育—教育家—人物研究—浙江省—近现代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495 号



出品人 范慧英

责任编辑 陈茜

封面设计 郑艺

编辑部热线 021-62797755

编辑部邮箱 shijiyinyue@163.com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

杨和平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社
(200031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世纪音乐教育文化传播公司
(200040 上海市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www.ewen.cc/centmusic/index.aspx)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75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444-2730-2/k.0031
定价 56.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来自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

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序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

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音乐教育家群体文化生态环境	4
第一节 浙江地域文化传统与特征	4
一、浙江地域文化传统	5
二、浙江地域文化特征	8
第二节 浙江地域音乐传统与近现代音乐教育	10
一、浙江地域音乐传统	10
二、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	12
第二章 音乐教育家群体构成与特征	15
第一节 音乐教育家群体构成	15
第二节 音乐教育家群体特征	18
第三节 音乐教育家群体作品	20
一、音乐创作	20
二、音乐教材	22
三、音乐译著	24
四、音乐论著	25
第三章 音乐教育家群体谱系与作品呈现	29
第一节 音乐教育家群体谱系	29
一、断裂接点与历史选择	30
二、空间意识与人文解释	31
三、谱系梳理与当代表达	33
第二节 群体音乐教育思想在历史坐标中生成	35
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横向脉络	35
二、群体音乐教育思想生成方式	35
第三节 群体音乐教育思想在历史发展中显现	36

一、古代中国音乐教育发展景观	36
二、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历史嬗变	42
第四章 音乐教育家群体谱系中的组织形式	48
第一节 创办艺术师范学校与发起“中华美育会”	48
一、创办艺术师范学校	48
二、发起“中华美育会”	50
三、编辑《美育》杂志	51
第二节 “春蜂乐会”组织	54
一、“春蜂乐会”成立	54
二、“春蜂乐会”群体	55
三、“春蜂乐会”影响	57
四、“春蜂乐会”局限	57
第五章 美育的倡导者——蔡元培	59
第一节 生命轨迹与音乐贡献	59
一、生命轨迹	59
二、音乐贡献	60
第二节 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方面	66
一、中西融合的思想	66
二、健全人格的思想	70
三、个性与群性思想	72
四、乐与德相辅思想	74
第六章 音乐教育启蒙者——李叔同	77
第一节 生命轨迹与音乐贡献	77
一、生命轨迹	77
二、音乐贡献	80
第二节 音乐教育思想主要方面	83
一、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思想	84
二、以学生为本的思想	87
三、爱国奉献的思想	89
四、乐歌创作的思想	92
五、《音乐小杂志》中的思想	96
第三节 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	98

一、人格教育的目标	98
二、学生为本的理念	101
三、乐歌创作的样式	103
第四节 音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105
一、审美核心的意义	106
二、学生为本的意义	107
三、爱国奉献的意义	108
四、乐歌创作的意义	109
第五节 音乐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	110
一、传统思想的局限	112
二、宗教思想的局限	112
三、西方思想的局限	114
第七章 音乐教育继承者——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	116
第一节 吴梦非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16
一、音乐教育思想	117
二、主要音乐贡献	119
三、音乐教材编写	121
第二节 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43
一、音乐教育思想	144
二、主要音乐贡献	146
第三节 刘质平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50
一、音乐教育思想	151
二、主要音乐贡献	152
第八章 音乐教育承续者(上)——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	155
第一节 钱君匋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55
一、音乐创作特征	156
二、音乐教育思想	157
三、主要音乐贡献	157
第二节 邱望湘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59
一、音乐创作特征	160
二、音乐教育思想	162
三、主要音乐贡献	162
第三节 陈啸空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68

一、音乐创作特征	169
二、音乐教育思想	170
三、主要音乐贡献	170
第四节 沈秉廉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77
一、音乐创作特征	177
二、音乐教育思想	178
三、主要音乐贡献	183
第九章 音乐教育承续者(下)——缪天瑞、俞绂棠、裘梦痕	190
第一节 缪天瑞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190
一、音乐教育思想	191
二、主要音乐贡献	194
第二节 俞绂棠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202
一、音乐教育思想	203
二、主要音乐贡献	208
第三节 裘梦痕的音乐教育思想与贡献	212
一、音乐教育思想	214
二、主要音乐贡献	218
余论:沿着先辈音乐教育家的足迹寻觅	222
附录一: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简明年表	224
附录二: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作品精选	236
附录三: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交往实录	294
一、李叔同与其老师蔡元培的交往	294
二、李叔同与吴梦非的交往	296
三、李叔同与刘质平的交往	297
四、李叔同与丰子恺的交往	304
五、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之间的交往	308
六、吴梦非、丰子恺与缪天瑞之间的交往	311
七、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与钱君匋的交往	312
八、刘质平与俞绂棠的交往	314
九、丰子恺与裘梦痕的交往	316
十、“春蜂乐会”成员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等之间的交往	319
参考文献	322
后记	333

绪 论

中国的 20 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求新图变的时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变革,我国音乐教育学科也在短短的百余年里,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半殖民主义,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其社会形态变迁犹如雷奔电驰。在继承我国古代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科学的音乐教育经验,将古代音乐教育形态转型为近代音乐教育科学;从广义的艺术教育转向具有特别指向的近现代音乐教育学科;从翻译、介绍西方音乐教育知识,到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点的音乐教育学科体系。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得我国近代以来音乐教育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和浮光掠影的特征,对许多音乐教育问题一掠而过,未能及时地展开广泛的、深入的探究;另一方面,又使得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在社会文化历史变革中,紧紧随着现实音乐生活的需求前行,致使我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上了时代的印迹。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49 年,又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纷杂的社会形态发展背景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教育观念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我国音乐教育从 20 世纪初年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长的过程。音乐教学制度、课程标准、教学方法、教材建设等等,无不如此。”^①如:1862 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成为近代我国新式学校的起点;19 世纪末我国兴起的新式学堂中,均未将音乐课程列为必修课。直到 1901 年,由上海地方政府创办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才在学校课程中设置了音乐课,这是我国现知最早开设音乐课的学校,从此揭开了我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新的一页。^② 研究我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探索在学校教育中设置音乐课这一历史实事,考察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音乐教育家,借鉴和学习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对于我国当代音乐教

① 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② 据我国当代著名音乐教育家、民族音乐学家王耀华先生说,早在 1898 年的福建厦门鼓浪屿岛上,就由外国传教士在小学校中教授音乐课。

育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中外音乐教育实践已证明:“任何时代的音乐教育思想,都是在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是受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和制约的。”^①我想,研究和探讨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也不能脱离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指导和制约这个历史事实。

所谓音乐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内容虽然各式各样,纷繁复杂,但无一例外地都围绕着培养人这个中心。”^②具体到音乐教育思想方面就是:音乐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音乐教育的目的与方针、音乐教育的内容、音乐教育的方法、音乐教育的对象——学生与教师等。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导致各个音乐教育家对音乐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不同,并存在着多种看法。针对具体的情况提出各自的意见,由此也就产生出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对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应该从他们所从事的具体音乐教育实践进行考察,进而阐明他们的音乐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和意义。

中华民族在历代音乐文化传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系统,并渗透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人的音乐教育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因此,本论题的研究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坚持以史为基础、以论为辅助、史论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的研究和写作中,采取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力图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研究过程将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充分尊重历史的真实面貌。因为研究和探讨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其真正的目的,应当是进一步从历史中接受启发,并对其合理思想加以发挥,以为今天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要。”^③所以,尊重历史事实,给研究对象以公允的评价,这是一个研究者最基本的责任和素质,也是研究本课题的基本思路。

二、研究和探讨这一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还应该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考察,不能仅就本论题中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研究,要透过中国近现代史中其他文化教育领域所反映出的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比照,从而揭示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

① 伍雍谊主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840—1949)》[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② 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③ 王树人著:《思辨哲学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的独特存在方式、本质规律、价值体系和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注重群体教育家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演化过程。这是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曾经发生着的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历史研究本身的性质,就应该是一门研究以往历史演化过程的学问。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到现存的音乐实际,中国传统音乐都不是一个狭隘的、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它是在不断的流动、吸收、融合和变异中延续着艺术生命的;同时,它又穿过无数岩石与坚冰的封锁,经历过种种失传威胁,才得以流传至今。”^①这就要求我们研究者必须用一种变化的观念去工作。尤其重要的是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又的确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流体”。所以,以发展变化的观念去把握它,是本论题研究的科学的思路。

四、将群体教育家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纳入到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和研究。“我们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存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存在总是历史的存在。所以真正追求历史的真实,就应该把它同追求对历史了解的真实结合起来;真正的历史真实就存在于对历史了解的中间,存在于对历史的解释、对历史的理解中间。而对历史的理解也正是对自己存在的理解。每个时代都不断地写历史,都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存在的要求来回顾历史,使历史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背景动力,决不是简单的知识和记录而已。”^②因此,笔者认为研究和探讨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将其置于 20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史实前提下,也是本论题应采取的一个角度和思路。

本论题取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视角,对蔡元培、李叔同及其嫡传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再传弟子缪天瑞、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沈秉廉、俞绂棠、裘梦痕等,这样一个在 20 世纪我国音乐教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的音乐教育家群体,从他们的生平足迹、音乐教育实践活动、音乐教育思想生成的文化、历史背景,主要音乐思想与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全面的、总体的、宏观有机的动态把握,并进一步阐明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在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这一学科如同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这样的成就中,有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无私奉献,有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汗水和心血,也有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智慧和成就。可以这样说,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的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是他们那个时代我国音乐教育发展的掠影,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过程中一道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

① 黄翔鹏著:《传统是一条河流》[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② 李泽厚著:《走我自己的路》[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56页。

第一章 音乐教育家群体文化生态环境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朱熹的这句名诗作为本章的开头，寓意有二：一是说明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现象并非“无源之水”。浙江自古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近现代浙江音乐教育家群体的出现，是浙江秀丽的山田水域、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的结果。二是开门见山，浙江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一条流向未来的河流，它有着百川归海的气概、净化荡涤的力量，千百年来融汇了无数涓涓细流、滔江大河，不仅“流水不腐”，而且还涌起无数绚丽多彩的浪花。若不去细探它，就不会知道它那丰富多变的来源，也不会理解它怎能如此纯净优质、个性鲜明！

第一节 浙江地域文化传统与特征

浙江省因境内主要河流钱塘江又名浙江而得名。浙江地处我国东南“黄金海岸线”中点和长江“黄金水道”终点上，沿海地区多港湾，是我国重要的东大门。东濒东海、南接福建、西连安徽江西、北邻上海江苏，地理位置十分显要。省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和盆地次之，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是孕育浙江文化的首要条件。在讨论浙江文化的同时，应了解什么是“文化”？关于“文化”，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国内外不同的解释约有二百多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辞海》这样解释“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①《国际百科全书》也指出：“‘文化’，术语有两个主要用法：（1）指高级文明的产品——诸如文学、艺术、哲学——因此它又用于形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有文化的人）；（2）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学者们用于形容人们历史与现实中共有独自特征，即思想、风俗、物质目标的创造，所有这一切的积累，以及对自然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533页。

环境极为复杂的适应。”^①可见,文化首先是人的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回首浙江地域的文化传统,温习浙江传统的人文特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地域文化传统

浙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发现所得,浙江的历史最早可延伸至距今约十万年前的“建德人”,他们在今浙江建德一带,开辟草莱,揭开浙江历史的序幕。为了生存、繁衍,他们不得不与荒芜、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最早开辟了浙江这块土地,从中体现出的智者因素、开创精神、团结力量以及勤劳勇敢的品质因子是浙江文化传统之河最初的滥觞。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辗过,到了新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先后出现浦江“上山文化”、嵊州“小黄山文化”、萧山“跨湖桥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等。²¹世纪初,北京大学文博院对上山遗址夹炭陶标本进行年代测定,表明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一万年,将浙江文明史在河姆渡文化七千年历史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三千年。这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共出土石器及陶器千余件,在夹炭陶片的表面,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和大量的稻壳、稻叶、稻米遗存,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最早的稻作遗存。上山遗址下层以大口盆、平底盆、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2005年在浙江省嵊州市小黄山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和浙东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同属于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浙江萧山跨湖桥文化距今八千年左右,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了以釜、钵、圈足盘、罐为代表的陶器群,它所在的萧山湘湖地区与余姚河姆渡文化只有百里之遥,但两处文化偏偏没有传承关系,其中出土的陶器,甚至比晚了一千年的河姆渡出土陶器更为先进。河姆渡遗址则出土有大量石、骨、木、陶质的生产工具,有成堆的谷粒、稻秆和稻叶等稻作遗存,还有骨哨、陶埙等乐器。考古人员还发现河姆渡人当时居住的是“干栏式”房屋建筑,采用了较复杂的卯榫结构。可想,聪敏的河姆渡人早在七千年前就在浙江这片土地上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惬意生活。随着考古不断发现,稍晚于河姆渡时代,在今嘉兴马家浜、吴兴钱三漾、余杭良渚等地,也有原始人类生活的遗址遗物。这些遗址约计二百多处,遍及了舟山群岛、浙西山区、温瑞平原、杭嘉湖平原等浙江东西南北各地,有些遗址遗物,如良渚遗址出土的各类玉器,其工艺水平已有相当高的程度,充分证明了远古时期浙江已是遍布聚

^① 转引自徐建春:《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J],浙江学刊(双月刊),1990年,第一期。

落、人文活跃的地区。

从以渔猎为生的“建德人”开始,到以稻作农业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历经了九万六千年左右,其间虽遭受几次海侵等严重自然灾害,但浙江文明的曙光仍生生不息,照亮并延续了千世万代。最先沐浴这份曙光的是继良渚文化之后一千年左右的于越人,有文字记载的浙江历史也始于此,如产生于秦汉时期的两部著作——《越绝书》^①和《吴越春秋》^②,就记载了于越民族的历史文化。《史记·夏本纪》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记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如今绍兴会稽山麓的大禹陵,传说是大禹的陵墓。《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夏后帝少康令其庶子无余守护大禹的陵寝,既而成为于越部落的首领。关于于越民族的来源,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本地区的土著居民”、“于越族名的意义是于越人的图腾符号和他们所特有的稻作文化生产工具的融合,是于越稻作文化从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特质。”^③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战胜了吴国,于越人足迹北踏山东琅琊;战国时浙江属楚;秦汉以来,设郡县,浙江成为国家的一个区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汉至两晋,隶扬州。最早出现“浙江”这一行政区域名称的是在唐朝,唐设道,乾元(公元758—760年)初分江南东道为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五代时,钱镠建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宋室南迁后,设临安(今杭州)为京都所在地,浙江分属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元设江浙行中书省。明初设浙江行中书省,浙江作为省名自此开始,后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为行省。1911年武昌起义,11月浙江光复。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实行省县二级制,设杭州市。1949年5月浙江解放。现行政区域分为杭州、嘉兴、湖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绍兴、宁波、舟山、台州等11个市(地区),全省以汉族人口居多,少数民族人口主要为畲族,也有少数回、满、苗等民族。浙江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历史沿革、民俗语言、经济方式等,促成了其特有的文化特色。

浙江山明水秀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浙江文化特色的首要条件,而多样化的地形结构:山地、平原、海洋、河流、盆地等又是形成浙江文化多元互补性的自然基础。从地下考古发现得知,无论是建德人筲路蓝缕的艰辛,还是上山人稻作农业的田趣,无论是神奇的跨湖桥夹炭陶、新颖的河姆渡干栏式木结构建筑,还是精致的良渚玉器以及各种生产和生活的器皿、物件等,都无不体现了浙江史前文化和浙江鼻祖自强不息、简朴务实的品质,机警敏捷、开拓创新的精神,勤劳刻苦、兼收并蓄的美德。

浙江文化传统的形成是多元互补、兼收并蓄的结果,历史上各个时期均有体

① [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② [东汉]赵晔原著、张觉校注:《吴越春秋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③ 滕复等编著:《浙江文化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43页。